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warm, golden-brown color scheme. In the upper hal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visible, winding across the landscape. In the lower left foreground, a large, ornate lion statue (shishi) is depicted, facing right. The lion is highly detail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arvings.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historical and majestic.

ZHONGGUO
QUANSHI

中国全史

[卷十二]

远方出版社

全案策划：大 地
封面设计：福瑞来



ISBN 7-80595-975-7



9 787805 959757 >

ISBN 7-80595-975-7/K·27

全套定价：1280.00元（全48卷）

中国全史

主编 程思源

通史 卷十二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丽娟

中国全史(通史卷)

主 编:程思源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4900 千字

印 张:338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 - 1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7 - 80595 - 975 - 7/K·27

定 价:1280.00 元(全 48 卷)

明宫三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三月，万历帝命福王赴洛阳封地，但是郑氏集团阴谋夺取皇位继承权，并未终止，他们一再策划谋害太子常洛，因而发生了明末著名的宫廷三案：挺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挺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四日。这一天，有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闯入皇太子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内官李鑑，一直闯到前殿檐下，被内官韩本用抓获，交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收留，翌日，皇太子奏闻，命法司提审。负责审问的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是浙党官吏，奏称：“人犯供名张差，系蓟州井儿峪民。语言颠倒，形似风（疯）狂。臣再三考讯，本犯嗷嗷称吃斋讨封等语。”企图以“疯颠”病人，糊涂结案。五月初十日，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审张差，供被李自强、李万仓烧了他的柴草，气愤不过，于四月来京，要赴朝声冤。从东边进，不识门径，往西走，正好路遇男子二人，诈曰：“尔无凭据，如何进？尔拿杠子一条来，便可当作冤状”等语。张差日夜气愤，失志颠狂，遂于五月四日拿枣木棍一条，仍复进城，从东华门直至慈庆宫门首，打伤守门人，在前殿下被缚。他们也怕牵涉郑氏集团，拟依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瓦伤人，一律当斩，决不待时，巴结郑氏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领袖方从哲也不提出深究。五月十三日，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案（同采）通过单独提审，使张差招称：“张差小名张五儿，父张义病故，有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

名老公，说：‘事成与尔几亩地种。’老公骑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铺，初四到京。”问何人收留？复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与我饭，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遂将枣木棍给我，领我由厚载门进到宫门上。守门阻我，我击之坠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缚。小爷（皇太子）福大。”王之寀认为，张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只是惧之以刑罚而不招，啜之以饮食，始欲默欲语，中多疑似。他主张穷追到底，纠出幕后指使者，愿皇上缚凶犯于文华殿前朝审。户部郎中陆大受上疏言：“张差业招一内宫，何以不言其名？明说一街道，何以不知其处？”疏中提到“奸戚”二字，矛头直指郑贵妃之兄郑国泰，疑郑国泰是张犯的后台，所以建议神宗“大振乾纲，务在首恶必得，邪谋永销，明肆凶人于朝市，以谢天下。”神宗对王之寀、陆大受等疏十分厌恶，疏俱不报。

御史过庭训及知州戚延龄具言其致颠始末，以张差“疯颠”二字定为铁案了事。

五月二十日，刑部司官再审张差，参加者有：胡士相、陆萝龙、邹绍光、曾曰唯、赵会桢、劳永嘉、王之寀、吴养源、曾元可、柯文、罗光鼎、曾道唯、刘继礼、吴孟登、岳骏声、唐嗣美、马德澧、朱瑞凤等十八人。供称：“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儿峪居住。又有姊夫孔道住本州城内。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铁瓦殿之庞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街之刘成。三舅、外父常往庞保处送碇，庞、刘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来，说打上宫中，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皇太子），吃也有，住也有。刘成跟我来，领进去，又说：‘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红票，封我为真人’等语。”刑部立即

派人前往蓟州提解马三道等，疏请法司提审庞保、刘成。五月廿七日，神宗再谕法司严刑鞫审，速正典刑。时语多涉戚臣郑国泰。郑国泰出揭自我表白。给事中何士晋奏：“陆大受疏内虽有身犯奸畹凶锋等语”？“而语及张差，原止欲追究内官姓名，大宅下落，并未直指国泰主谋。此时张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国泰岂不能从容少待，辄尔具揭张皇（惶），人遂不能无疑。”他一针见血指出：“若欲释疑，计惟明告宫中，力求皇上速将张差所供庞保、刘成立送法司考讯，如有国泰主谋，是大逆罪人。臣等执法讨贼，不但宫中不能庇，即皇上亦不能庇。设与国泰无干，令国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后凡皇太子、皇长孙一切起居，俱系郑国泰保护，稍有疏虞，即便坐罪。”“若今日畏各犯招举”，“或潜散党与使远遁，或阴毙张差使口灭，则疑复生疑，将成实事，惟有审处以消后祸”。何士晋、陆大受和王之案等推断，挺击案出于郑贵妃其兄郑国泰谋害皇太子的阴谋案，坚决要求穷追到底。神宗看出案情牵连到自己的宠妃及其国舅郑国泰，只得亲自出面，于五月廿八日在慈宁宫召见群臣，宣谕：“忽有风（疯）颠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庭有许多间说，尔等谁无父子，乃欲离间我耶？”他拉着太子常洛手，向百官说什么“此儿极孝，我极爱惜。”；又说“福王已赴封地，太子之位已定”，“今又何疑？”神宗下令立即将张差以“疯颠奸徒”之罪，斩首于市，又把郑贵妃宫内参与此事的两个内监庞保、刘成在内廷凌迟处死，草草了结这件大案，并指出：“不许波及无辜一人”，保护了郑贵妃和郑国泰。而王之案却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神宗竟将他削职为民。

红丸案发生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万历四十八年

(1620年)七月，神宗病死，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八月十日，光宗得病，召医官陈玺等诊视。八月十二日，他病情加重，“圣容顿减”。八月十四日，内臣崔文升进了泄药。光宗服后病情更重，一昼夜泄三、四十起，有时来不及上厕，竟便在床褥上。八月十六日光宗病得无法上朝，数夜不能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苏软，不能动履。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御史郑宗周上书首辅方从哲，谴责崔文升给光宗进错药方。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上言：“贼臣崔文升不知医，不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为赏减。”

八月二十九日，光宗召诸臣于乾清宫，因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奏称：“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光宗即命李可灼至。李诊视后，拒言病源及治法，进奉光宗服两颗红丸后，不到两天，在九月初一日突然“驾崩”，于是廷臣大哗。对于光宗服红丸立即宾天，中外藉藉，以李可灼误下劫剂，恐有情弊。而方从哲反而拟旨赏赐李可灼白银五十两，更加激起了朝臣的责难。御史王安舜认为崔文升、李可灼是“庸医杀人”。御史郑宗周上言：“应该寸斩（崔）文升以谢九庙”。东林党人，给事中惠世扬、高攀龙等先后上书，指出故意用泄药的崔文升“素为郑氏腹心”，直斥“郑贵妃包藏祸心”，责问方从哲为何“必加曲庇？”还联系前事，声称“往者张差谋逆，实系郑国泰主谋。”由于郑氏集团和方从哲的阻挠，此案未予追究。直到天启四年（1624年），朝廷才判处李可灼遣戍，崔文升贬谪到南京。

明光宗于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继位，郑贵妃为了控制他，将自己宫中的李选侍（选侍系宫中无封号的宫嫔）送给光

宗，深得光宗的宠爱。光宗死后，由其长子十六岁的朱由校继，是为熹宗。李选侍应立即迁出宫内正殿乾清宫。但是，李选侍企图挟持熹宗以擅权，仍与朱由校居住在乾清宫内，不肯迁出。她还让心腹太监窃盗宫中珍宝，以贿赂首辅方从哲。制造舆论，说皇长子年幼，需要李选侍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指出，皇长子已经长大成人，“何必托于妇人女子之手？”并一针见血揭露说，这是“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惠世扬斥责“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指责方从哲通过内监得到大量贿赂珍宝，同李选侍相勾结。在这场移宫案的争议中，郑贵妃、李选侍和方从哲一方面理亏，二方面当时还没有夺取最高权力，东林党人后来占了上风，李选侍终于移出乾清宫，迫使迁至哕鸾宫。朱由校在东林党人支持下，摆脱了李选侍的挟制，于九月初六日正式即位。

文学

文学方面，比较有特色的，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三方面。

诗文 明初开国时，刘基、宋濂等多以文名世，诗人高启所著古诗更是脍炙人口，永乐北迁后，诗文大都趋向文笔工整，词章藻丽，内容多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为解缙、三杨所提倡，帝王宫廷所支持，称“台阁体”。正统时，大儒薛瑄等仍以台阁体相标榜。但台阁体大都为应制、应酬之作，缺乏活力，逐步为一部分士大夫所不满，至弘治时，被称为拟古派的复古运动遂应运而起。

拟古派的文学复古运动前后掀起两次高潮，时间达百余年之久。第一次高潮称为前七子时期，从弘治时开始。代表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而以李、何为首。他们树起“复古大旗”，“文称左迁，赋尚屈宋，古诗体尚汉魏，近律则法李杜”，理论上以“文必秦汉，诗比盛唐”相号召。第二次高潮从嘉靖时起，称为后七子时期，代表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而以李、王为首。李文所作至“一字一句摹拟古人”，王世贞影响更大，天下无不争效其体。在政治上，“前后七子”，大都是反权贵的，他们在官僚地主中属于中、小地主阶层。在文体上，拟古派反对台阁体，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的改革运动，但随着时间的转移，他们则成为保守派，阻滞了文学的发展。明中期的文学领域中，从沈周开始，直到正德时的唐寅、文徵明、祝允明，都是中小地主阶层的在野派，他们不仅精于诗文，且擅长诗、画，唐寅才华横溢，其狂放不羁在封建社会中也是罕见的。他们受商品经济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勃兴的影响，企图摆脱传统文学框架的束缚，颇有朦胧的个性解放的特点。

在嘉靖时极力反对拟古派而又独来独往的文士在江浙有徐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在四川还有杨慎等。

万历时，坚决反对拟古派复古运动的公安派、竟陵派又在文坛兴起。后两派都是湖广的文学流派。公安派有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三兄弟，而以袁宏道最为突出；竟陵派有钟惺和谭元春。公安派是拟古派的死敌，此派一洗学人追尚拟古派的局面，为文为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派与李贽、汤显祖为至友，习性、好尚皆有相同相通之处，也都具有一定的叛逆意味。

小说 明代的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最著名的为《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和《金瓶梅》。《水浒传》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的，是根据宋元以来有关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话本和杂剧编写而成。作者塑造了各种不同性格的反抗者的典型形象，歌颂了农民战争和农民英雄，同情他们“逼上梁山”的悲愤的遭遇。此书对长期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农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特别是对明末农民起义有深远的影响。水浒的故事在各地广泛流传，有的演为戏文，或从说书人的口中传播开来。罗贯中根据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编写成的《三国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根据历史编成的小说。书中描写了魏蜀吴三国之间复杂错综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塑造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形象。吴承恩作的《西游记》通过各种神化的故事和人物，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明统治者的腐朽以及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同时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坚决向一切灾害困难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品质。但作者还不能摆脱“佛法无边”和“轮回”、“报应”等宿命论的思想。署名兰陵笑笑生撰的《金瓶梅》，较深刻地刻画了封建社会中大商人、土豪劣绅家庭的骄奢淫逸生活以及他们勾结地方官僚和最高权贵宦官的罪恶活动。所写还有世俗的风土人情。但淫秽行为和变态心理的描绘使该书减色不少。明代长篇小说比较著名的还有《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遂平妖传》、《禅真逸史》等。此外，明代的短篇白话小说“三言两拍”，即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和《喻世明言》，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更为脍炙人口。“三言二拍”中有很多封建糟粕，但其中某些篇章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了封建礼教

的束缚，对男女之间的自由爱慕寄予充分的同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娘》、《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这些小说后被改编为戏曲，几百年来，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戏曲 在明代，杂剧已日益衰落，来自民间的南戏却不减昔时之盛。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士人的提倡，戏剧已成为城市居民不可缺少的文化活动。江南各地的地方戏非常流行，有余姚、海盐、弋阳诸腔。嘉靖时，昆山乐工魏良辅和剧作家梁辰鱼合作创成昆曲，用笛管笙琶合奏，以后传入北京，也成为北京流行的戏曲。传奇方面，经明初文人的改编润色，宋元时的南戏《荆钗记》、《白兔记》（即《刘知远》）、《拜月记》、《杀狗记》等，被称为荆、刘、拜、杀，即明初的四大传奇。其后，汤显祖有《还魂记》（即《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被称为“临川四梦”，以《还魂记》最著名。明朝的传奇打破传统规格，情节也更加复杂。汤显祖是万历时期著名的戏剧作家。他反对在传奇的写作上过分讲求音韵和格律，所创作的剧本也打破了音韵、格律的限制，而注意其结构和思想内容。代表作《牡丹亭》是明代传奇艺术的高峰。晚明的作家高濂的《玉簪记》和周朝俊的《红梅记》都是仅次于《牡丹亭》的写情的出色作品。另一戏剧家李玉所写的传奇《一捧雪》和《清忠谱》（即《五人义》），直接揭露严嵩、严世藩父子和宦官魏忠贤的罪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史学

明前期官修史籍多，后期私纂史籍多，这与明代专制主义中

央集权政治的强弱以及王学的兴起有一定的关联。明后期著名的史学家有郑晓、高岱、王世贞、李贽、焦贻、严衍、谈迁、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他们把史籍分为国史、野史和家乘三类，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面貌，有助于对史料更客观地进行对比研究和探索。

国史 包括实录、会典和正史等书。正史中的《元史》二百一十卷，是太祖洪武二年至三年修纂的，总裁官是宋濂和王祿。此书虽有缺点，但完整保存至今，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官修的《明实录》和建文、景泰两帝的附录，几乎囊括了明代的全部历史。实录除皇家诏谕外，还引用和记载了大量的大臣奏疏和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活动的材料。但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所偏护和隐讳，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也不公允。《大明会典》是记载明章国典的，今存两种。一是正德《大明会典》，共一百八十卷，截止于孝宗弘治十五年，正德四年刊行。一是万历《大明会典》，共二百二十八卷，新补了嘉隆等朝的条例，万历十五年刊行。两书可相互参考。会典类今存者还有洪武时的《诸司职掌》和嘉靖时戴金所辑《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野史 包括非官书的别史、杂史和笔记等。明后期私人所编历史极多，不仅可正国史之是非，还可补国史之不足。以明代论，属于纪传体的有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邓元锡《皇明书》、李贽《续藏书》和尹守衡《明史窃》等；属于编年体的有薛橐应《宪章录》黄光昇《昭代典则》、陈建《皇明从信录》和《皇明通纪辑要》、谈迁《国榷》。属于纪事本末体的有高岱《宏猷录》；属于杂史类的有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朱国桢《皇

明史概》；属于典制类的有徐学聚《国朝典汇》、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属于笔记类的有叶盛《水东日记》、王锜《寓圃杂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谢肇淛《五杂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

家乘 包括私纂的碑传、行状、年谱、家谱等书。碑传总集著名的有徐紘撰《明名臣琬琰录》及《续录》，还有焦贻《国朝献徵录》，有的年谱、行状是单行的，如戚国祚《戚少保年谱耆编》、《李东阳年谱》、《霍韬年谱》、《顾亭林年谱》等；有的则附录在文集中，如张居正《张江陵文集》附录行状，周顺昌《烬余集》附录年谱，《海瑞集》则行状、碑传、年谱皆有附录，此外，还有大量抄本的家谱出现，以供研究之资。家乘每多谀词，须与国史和野史相互参照。

明人重当代史，对古史的研究亦有成绩。如张溥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论评，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冯琦和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等。

地理学

明代地理学著作与史学近似，前期多官修，后期多私修，方志的纂修在明后期也成为一种风尚。

《寰宇通志》系景泰时陈循等奉敕纂，《大明一统志》系天顺时李贤等奉敕纂。这两部书勾画了明朝的疆域全貌，是今天保存下来的研究明前期地理形势的绝好资料。罗洪先《广舆图》是明朝的一部著名的地图集，是以元朝朱思本《舆地图》为底本，改编为明朝内容创制而成的，有十三布政司图、九边图和漕运图

等。西洋传教士利玛窦也在北京绘制了若干中国地图，其中最著名的是《坤輿万国全图》。这是一本世界地图，但把中国摆放在图中央。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采集史料丰富，重在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以及对各地形险要的叙述，考证翔实。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是方志资料汇编，书中保存了各地大量的经济风俗资料。他还著有《肇域志》无刻，有抄本。

明朝末年，南直隶江阴人徐弘祖周游全国，考察山川地形，编有《徐霞客游记》。书中极为详细考察了云、贵、川、广等十余省的地理状况，还揭示了中国西南石灰岩地区溶蚀地貌的特征。他是世界上在溶蚀地貌方面进行考察的第一人。

军事学

明代的军事技术、装备和作战方法有较显著的变化，军事理论研究有较大的发展。洪武年间，各地卫所驻军已有百分之十装备火铳。永乐前期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队神机营。明中期戚继光编练的水、步、骑、车、辎重等营，使用枪炮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数的一半左右，车营平均每十二名士兵装备一门火炮，骑兵装配六十门虎蹲炮。明后期由于倭寇侵扰，北边警繁，欧洲殖民者的寻衅，促使一些学者提出经武练兵和充实边防海防的许多新观点、新措施。各具特色的军事著作纷纷问世，主要有最早提出御近海、固海岸、严城守的海防战略理论和绘测沿海地图、海防图的《筹海图编》；以练兵、教战、用器、布阵见长的名著《纪效新书》、《练兵纪实》、《阵记》；精于火药、火器研究的《兵录》；茅元仪辑的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汇集了历代军

事理论、战略战术、军用物资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实际上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军事学史。此外还有传播西方火器制造和使用技术的《神器谱》、《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等。

文献学

明代编辑了大量的类书和丛书。其中类书《永乐大典》世界驰名，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包括目录凡例），二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辑入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艺、农艺等图书七八千种，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

随着民间刻书业的发展和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要求，江南地区刊刻丛书者很多，有关各代历史特别是明代历史的有《今献汇言》、《历代小史》、《纪录汇编》、《百陵学山》、《盐邑志林》、《国朝典故》等。这些书的问世，开清代丛书大盛之先，但是搜书求种类多而非全本，刻字亦多有讹误。

检阅有关明代存储的图书资料，官修的以杨士奇等奉敕纂修的《文渊阁书目》和万历时焦璐奉敕纂修的《国史经籍志》最著名。私纂者至明代中后期也越来越多，如叶盛《菴堂书目》、朱睦㮮《万卷堂书目》、祁彪佳《淡生堂书目》、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等。

宋应星和《天工开物》

明朝末年，继李时珍、徐光启之后，又出现了一位在科学技术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就是因写作《天工开物》而誉满中外的宋应星。

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县人。由于封建时代不重视科学技术，《明史》没有为他立传，但是，江西省志及一些地方志书却保留了他的生平事迹的片断记载。他大约于万历十五年（1587）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阶级家庭，曾祖宋景曾任南京工部尚书，督修过宫殿；还有一位族人宋应和，也任过工部员外郎的职务。作为仕宦世家的子弟，他自幼诵习经书，而先辈及族人担任工部官员，这特殊的家庭环境又使他从小耳濡目染建筑和手工业等方面的知识，比一般儒生更注意切实有用的学识。万历四十三年（1615），他和哥哥宋应昇同科中举。崇祯七年（1634），宋应星被任命为江西分宜县教谕（县学的教官），四年以后又出任福建汀州推官，崇祯十四年（1641）升任安徽亳州知府。不久，明朝覆亡，清兵入关，在那充满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激烈的民族斗争的年代，宋应星弃官返乡，终老山林。他的卒年，大约在清朝顺治末年。（即1661年前后）。

宋应星生活的时代，一方面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大，分工细，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都比以前进步，达到了新的水平。宋应星是个注重实际知识的学者。他关心世事，重视了解农、工、商各行各业的情况，强调对客观事物认真观察和仔细调查，说：“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他批评那些实际上毫无实践经验和知识，凡事只会凭主观“臆度”的所谓“聪明博物者”。这一认识论上的观点，使他从当时那具有新水平的经济活动中获得广博的学识。这个时代的另一方面是，明朝末年的政治极端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复杂。作为一个比较有远见的封建官僚，他看到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人民的疾苦，对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腐朽无能至为不满。他曾揭露封建